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四八期 ——
(二〇〇五年八月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8b)

【回眸历史】野蛮的“文明”——读《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纪略》有感	陈小雅
【史海钩沉】邓拓的间接死因——兼谈“邓拓倒卖文物案”真相	陈小雅
【人物春秋】王力沉浮录	霞 飞
【往事回首】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	李达南
【历史一页】陆定一谈文革经历	纪希晨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回眸历史】

野蛮的“文明”——读《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纪略》有感

• 陈小雅 •

文物无价。其本身价值是包含于其内在的文化含量之中的。在市场上，其价格主要决定于两类人的哄抬和追捧：一类是文人雅士或附庸风雅之士；一类是为挣这些文人雅士和附庸之士的钱的财富追逐者。在全民性财富积累的热潮中，它成为公众追逐的品种，从侧面衬托出文明“鼎盛”时代的繁荣景象；在“改朝换代”之际，强梁对它的劫夺活动，则是打印在这些“文明”遗物上的野蛮污迹。在文革中，这类劫夺活动曾演为高峰，尤其是一批根本不懂文物的“武人”的介入，使这一丑剧更披上荒诞的色彩。本期《开放》转载的《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纪略》（以下简称“章文”），就是一个直接的证据。

◇ 文革中的另类“血腥”

文革是一场以“革命”名义进行的大规模权力易手运动，期间伴随着对公民生命的戕害、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和对文明的摧残。但作为文革时期的一个小学生，笔者得知文革“破四旧”运动中窃夺文物这一幕，还始于林青山的《康生外传》。以后，又从文聿的

《中国“左”祸》中得窥这一“浩劫”的规模。文聿说：

据统计，仅在北京市，……各炼铜厂抢救出的各类金属文物达117吨之重，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达320多万吨，在各个抄查物资集中点里，挑拣出的字画有18·5万件，古旧图书达235·7万册，其他各类文物为538万件。

那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红卫兵的心目中是“活着的四旧”，是“封资修”的“最大的代表人物”，所以必须对他们实行最严厉的革命行动。结果，除民建以外，其他所有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有100人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

八、九两月中，仅北京市，被赶出城市轰回原籍者竟达85198人！被抄家者竟有33695户！在上海，从8月23日到9月8日，全市共抄家84222户，其中高级知识分子、教师1231户；在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被抄家者为64056户，抄走文物达17万件之多，那些被抄走的东西，很多并不是文物，而是家具、化妆品、鞋袜、衣服、电视机、钢琴等，堆积如山，最后被廉价变卖掉。……仅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北京市在抄家过程中就抄出10·31万两黄金、34·52万两白银，5545·99万现金，61·36万件文物和玉器，枪支268支，子弹1·1万发。而这，相信只是已上交部分的不完全统计。

据目睹者称，每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过后，天安门广场上一片狼籍，有鞋、帽、红宝书，而且竟然还有不少闪闪发亮的金银制品……

由于作者与前北京市委要人的关系，辅之以晚近出版的吴德的回忆录的相关印证，笔者相信，这是事后官方掌握的统计数据。

从这些叙述中，我们可知，文革的所谓“破四旧”运动，在“正史”中是一场针对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及其承载物的“革命”运动，但参照“野史”、“外传”、的记载，就会发现，其中有不少活动，是为“夺宝”而设计的、有既定目标的匪盗行为，即使按当时律法，也是严重罪行。

◇ 两桩自杀案背后的“夺财之恨”？

世人人都知道，在那场浩劫序幕拉开前，首先被推上“祭坛”的两位才子——田家英和邓拓——是因为不满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对彭德怀抱有同情的“路线之争”，而遭受迫害自杀身亡的。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同时又都是“文物收藏迷”；他们也因此而遭到陈伯达、康生的嫉恨。而后面这两位，“恰巧”分别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所倚重的两个“亲信集团”的军师。

关于田家英搜集文物字画的故事，在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田家英的亲友、同事编辑的纪念文集中，都有颇为详尽的记载。据他的长子曾自说，八十年代田家英平反后，中央办公厅退回的抄家物资中，光是书籍字画就有一卡车。其中文物字画究竟有多少？曾自说：“除‘文革’中陈伯达等人掠去一些精品遗失外，现存的还有一千几百件”。据今年《开放》二月号刊登陈伯达儿子陈晓农的文章披露，这些“真伪藏品”的较准确的数字，应是“一千五百多件”。这些“劫后余生”的藏品，曾令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都感到汗颜。他说：

“过去知道家英收藏清人墨迹，只当是收收而已，想不到竟这样齐全、系统，他的鉴赏能力之高，收藏之丰，令人佩服。……搞了一辈子文物鉴定，有些名家只知其名，未见其字，这次从家英藏品中大饱了眼福。”

而周恩来的秘书、也是田家英的诗文旧友梅行说，家英收藏的“规模之大，用心之深”，他只是后来才知道的。

田家英搜求文物字画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尤其是文化重镇的北京、上海和杭州。那里的古旧书店、古玩店、文物商店和文物保管委员会，都是其稔熟之地。凡有动静，就会有人通风报信。据曾自说，北京琉璃厂松古堂老板就“经常帮父亲选购一些好书，有时还亲自送到中南海门口”……

那么，田家英是如何为此事开罪于陈伯达的呢？一直有传闻说，是为了一幅“海为龙世界，天（云）是鹤家乡”的对联。不久前，陈烈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披露了相关细节，才使故事的全貌浮出水面：

原来，田因工作之便，曾多次随毛到杭州小住，通过那里的古旧书店搜集了不少江浙一带的清代名人墨迹。1961年，大概是因为经济困难，不少人将祖传的文物珍品拿出来换钱糊口，所以，过去一些只能在画册上看到的文物，这一时期都流散到市面上来了。碰“巧”，这时田又奉命到杭州搞“农村搞调查”，“意外”发现了清代著名篆刻家、书法家“完白山人”的这幅对联，立即买了下来。田回京后，曾向毛泽东展示过收获，毛看了好，就借去挂了一段时间。此事，梅行和范用都知道。毛泽东喜欢此联，大概除了邓石如的名气和字以外，大概还因联中的上阙所说的“龙”，是他的属相；而江青原名就是“云鹤”！田花了多少钱买这幅联没有披露，但他的儿子说，1963年田再次去杭州时，曾托史莽寻找一幅丁敬的字，以补“西泠八家”之缺。在送来的两张中，田不惜“重金”——花了六十元人民币买下了其中一张。此事为家人记载，可见有“史无前例”的意义。所以，据此推测，前述邓石如的名联，应是用少于这个价格买下的。

陈伯达是在毛泽东处看到此联的，随即要求参观了田家英的收藏。不知是出于什么心理，这位“老夫子”当时说了一句：

“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画，可得当心点，别让小偷偷了。”

田却回了一句：“我的字画如果被偷，第一个贼就是你！”

当时，两人“哈哈”一笑而过，但不幸的是，田氏的玩笑话，竟也“一语成谶”……

邓拓与康生的过节，没有遭到这么多人的议论，也没有如此清晰的过程披露，但据去年十月《纵横》杂志杨泽南的文章介绍，早在1963年，邓拓就因介入一批数量庞大的文物易手活动，以“抢购争购倒卖国家文物字画、非法获利几千元”的罪名，被“中央某部”发了“通报”。由于北京市委彭真力挺，刘仁挂帅，亲自组织专案组调查“澄清”，此事并未把邓整垮，但他们不幸都没能逃过文革这一劫——邓拓自杀，刘死在秦城狱中，北京市委成了毛泽东眼中“盘根错节”的、第一个要炸毁的“桥头堡”。

林青山称，文革“破四旧”运动中，邓拓的收藏顺理成章的就成了康生觊觎的第一目标。

◇ 凸显“两案”缺陷

章文所披露的情况，在笔者有限的眼界中，是第一次以史料、言证而不是野史、外传的形式，揭发出了那场劫夺的令人震惊的一幕。它填补了宏观叙事与野史、外传之间的空白，使前者的数字赋予了生命的故事而有了下文，使后者的“演义”变得可信，并有了相当的证据。所

以，它应是揭露文革罪恶的系列工程中难得的材料。

但是，读罢该文，笔者心中升起的一个问题是：如此“证据确凿”的“窃夺”，为什么没有反映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法律审判中？按照“两案”的审理标准，亦即《刑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实施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这就是说，章文揭示的行为，要么适用于文革前的法律、法令和政策，也就是当年据以对邓拓行为立案的法律、法令和政策；要么适用于文革期间的法律、法令和政策，除非这两条都不适用，而《刑法》又“不认为是犯罪”的，才可以免于起诉。

章文揭示的暴行未与起诉，究竟是属于哪一类情况呢？笔者基本上是一个“法盲”，在此提出，希望能得到专家指点和知情者的进一步揭示。不过，显然的是，1980年举行的“两案”审判，本来有两个重大的缺陷：

其一，是“主犯”的缺席和用主犯制定的“规则”审判从犯；
其二，是漠视普通人遭受的不幸。

而章文所披露的情况，则将其第三个重大缺陷揭示出来，那就是“财产权”概念的缺席。正是这一点，更加凸现出：当年的“两案”审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活动，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审判”的性质。

◇ 是“力证”，不是“铁证”

当然，以笔者的陋见，仅就章文所提供的“证据”，仍是不够论罪的：

第一，它不是事发当时的“原始物证”。它所产生的时间是1974年3月2日。这个时间意味着，它是“林彪事件”爆发三年以后，“四人帮”组织的“专案组”的遗留物。那个时代的法治状况，是不能使人放心的。

第二，材料上书“记录”二字，可见它既不是“当事人亲笔书写的原件”，也不是“手续经办人写的揭发材料”，而可能是专案人员根据口述和某种原始记录归纳整理出来的材料。尽管上面都有当事人的“亲笔签名”，但却是未经法庭核实与对证的记录。

第三，没有林彪本人光顾的记录。材料中“最高首长”究竟指的是谁？是假托还是实指？无法确定

第四，把退还物品的时间、次数与取走物品的时间、次数混为一谈。如材料说到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陈伯达做贼心虚，已指使其喽罗“逐渐”退回物品，如在1971年的2月、3月就开始退物，但材料又说他们直至1971年的7月、8月，甚至“九一三”事件后的9月15日、18日还来“拿东西”。这就显得自相矛盾了。

第五，物品的价值不确，价格参照的是何时的标准？不清楚。

第六，除叶群、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和林彪的某秘书、叶

群的某秘书、陈伯达的某秘书、陈伯达的儿子、李作鹏的老婆、邱会作的老婆、戚本禹等人外，所谓“随从”、“喽罗”都无姓名和身份。其中还有如下一些叙述令人生疑：

XXX说，“凡是好的，都留下一人给一份”，“最高首长一份，黄……”XXX给每个人起了代号。XX来了以后问过陈伯达，“我们不写名字，丢了不好”，从此用代号，陈伯达是104，因为他是第四号人物，XX用107、叶群108、李作鹏124，邱是……

众所周知，林彪在自己的办公室曾使用过101的代号，但也只有林办主任——他自己的老婆叶群这样称呼他，而且这并不是标志他是第几号人物的代号。即使按照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排序，在1970年庐山会议之前，陈伯达应排在第五位而不是第四位。而毛泽东则应是101号。因此，上文关于代号的编派之说，疑似信口开河之说。更何况就事理而言，其内部如何“分赃”，是没有必要对文管会的人说的。当众说出这样的话来，很可能是“打着领导的旗号来进行窃夺”的。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章文所依据的材料，是揭示康生、陈伯达，叶群和黄永胜等人“贪官”嘴脸，尤其是他们假“革命”之名以徇私的“力证”，但还不是“铁证”。

以一位法律界朋友之见，林彪集团究竟“窃夺”了多少文物，应以事发后查抄的物品为证。这大概就是法律上所說的“物证”的作用。显然，这个案子至今还没立案、审理。根据文聿披露的北京市一地抄家物资中“挑拣出的字画有18.5万件，古旧图书达235.7万册，其他各类文物为53.8万件”这个数字，林彪集团抢走的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据笔者所知，到目前为止，尚有大量在“文革”中被抄走的物品尚未被追回，或下落不明，有的追回物品则被以假换真。这说明，政府和法制机关应当履行的追讨“文革”侵害私人财产的义务，并不能因“两案”的了结而画上句号。

2005年4月9日 于北京

□ 原载《开放》2005年5期

~~~~~

【史海钩沉】

邓拓的间接死因  
——兼谈“邓拓倒卖文物案”真相

• 陈小雅 •

1966年文革大规模拉开序幕前夕，发生在京城的两大大“自杀”案，曾经震动一时。后人都知道，事件的主角——邓拓和田家英，都是因为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不满，为彭德怀“翻案”或抱有同情，换言之，是因为“路线斗争”的原因遭受迫害自杀身亡的。前者的忌日是5月18日，后者的忌日是5月23日，两者前后相差只有五天。事后想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连发生两桩如此重要人物的自杀案件，的确是对即将发生的全民族的“血光之灾”发出的一种预告。

按照事理和时间的逻辑，邓拓的直接死因，应该是：

一、当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署名“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把他和吴晗、廖沫沙“三家村”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二、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

三、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5月17日夜，邓拓在遗书中写下“我要再一次地高呼……”等革命口号后，于5月18日凌晨服安眠药自尽。他的受政治迫害而死，为自己的信念和人格尊严而死，为家人少受惊吓和凌辱而死，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不过，最近《纵横》杂志发表的杨泽南先生的文章（以下简称“杨文”）揭示，邓拓之“受迫害”和遭嫉于江青，是更早的事情。

该文说，早在“1963年秋，中央某部发了个通报，通报说：‘邓拓有严重问题！抢购争购倒卖国家文物字画，非法获利几千元。’”此事一出，内部震惊！

根据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反调查”的指示，北京市长刘仁亲自挂帅，组成了一个有北京市纪委书记、宣传部长、办公厅主任、农村工作部长、市委秘书长等参加的“六人专案组”。他们首先从邓拓的家中查起。据参加者朱方狮回忆，第一次走进邓拓家，他们一行大开眼界：“……一共九间房，间间都是字画，墙上挂满了。”

开始，他们“一件一件地问，一件一件地查。”后来发现这不是个办法，这么多的字画，恐怕查到猴年马月也查不完。经过商讨，他们决定从“通报”的指控入手，先查那幅文件提到的“宋代古画”……

经过长达九个月的调查，据杨文说，此事的实际真相是这样的：

一年前，一个名号“白石老人”（不是齐白石）的收藏家来到北京。随身带有一幅苏东坡的画卷，想卖给国家。他找到了文化部文物局、故宫博物院，面见了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但是不知什么原因，吴仲超建议白石老人将画给邓拓看看，说邓“特别喜欢字画，鉴赏力也特别强”。

当晚，吴就在全聚德烤鸭店设宴，请邓拓和白石老人同赴。三人一边吃烤鸭，一边鉴赏那件字画。经过邓拓鉴定，该画被认定为真迹。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白石老人一时高兴，买卖的事似乎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他说：

“这幅画以后就归您收藏吧！”

邓拓是个君子，决不讹人财货，仍然说：“这幅画很值钱的啊！”

“钱多钱少无所谓，你看着给就行了。”老人似乎有点后悔，但又不好改口。

邓拓于是以“两万五千元”定价，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天价”。自己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怎么办？他就让老人到他家去，任其挑选自己的藏品，以画换画。老人同意。于是一行人趁热打铁——又连夜赶到邓家……

最终，老人在邓拓的藏品中挑选了二十七幅字画。他一不做二不休，第二天就转手卖给了文物商店，正好获现金“两万五千元”！

到此为止，专案组最后以一篇“换画”的调查报告获得了中央通过。而不依不饶的似乎只有江青一个。江青并不懂字画，对于这类收藏也从未表现出什么兴趣，对邓拓应该不存在那种“恨羨交织”的感情。那么，她为什么要对此不依不饶呢？杨文的解释是，北京市的领导人从不买她的账——不陪她看戏。相信此说是有根据的。因为据R·特里尔的《江青全传》介绍，1962—1963年，正是江青开始着手“戏剧革命”的年头。她先是想取得北京市有关方面的支持，但是却“热脸凑上了冷屁股”。在北京失望以后，她于是转道南下——开始在上海寻找同盟者。在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热情支持下，江青才得以在那里经营出一个“小圈子”，也就是后来被毛泽东倚重，用来发动文革的“四人帮”亲信集团。

但是，江青又是如何知道那些文物生意场上的事情的呢？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说，江青在“破四旧”运动中，曾参与掠夺查抄文物和工艺美术品的活动，所掠“金表、玉器、书画、瓷器等珍珠、翡翠、文房四宝，竟达一千零八十七件，约值十三万一千二百元，而江青只付出二十元六角四分。但这些活动，具有鲜明的“敛财”性质，而非真正对文物有什么爱好，且都是在康生和陈伯达的引导下投入的。R·特里尔记载，江青个人唯一一次对古文物表现出兴趣的时间大约在1974年，那时，陕西省咸阳市的韩家湾公社出土了一枚“吕后印”，估计是受了谗海迷信的挑唆，从此江青开始到处大讲吕后的“丰功伟绩”和历代女皇、以及母系社会的故事。但是，她的此举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司马昭之心”，是路人皆知的，何况那也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笔者认为，杨文在讲述1963年这个关于江青和邓拓的故事中，恐怕漏掉了一个人，那就是对文物界行情“门儿清”、在此行布有广大“眼线”的康生。他对文物的“研究兴趣”广为人知，可以与之媲美者，恐怕只有郭沫若一人。

但是，康生敛集文物，多是凭借“空手道”——以权谋材、以势谋材。根据林青山的《康生外传》，他从文管会或故宫索要藏品，最多只象征性地交几块钱。如北京市文管处库房里的一幅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所书，国内仅存三件，康生只以十元钱就“买”下了；北宋黄庭坚的一幅真迹——“腊梅三友”，仅用五元钱就“买”下了。最后，他说荷包里只剩一角钱，仍然“买”走了价值几十万元的宋画院仿赵干的《起蛟图》……因此，他是决计不会与“白石老人”这样没有权势的人，讲什么“公平交易”的。除去别的因素不考虑，为当事人着想，作为买卖中介者的吴院长当初没有把老人介绍给康生，而是介绍给了邓拓，料想也有这层原因在内。但在康生一方，自然就成为人生的一桩“恨事”了！

但如果是康生从中上下其手，他又如何能说得动当时还没有很大权势的江青，去替自己火中取栗呢？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康生临死前所做的那件“出卖”江青的事——1975年，他听说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和四人帮后，把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蓉和唐文生叫到病榻前，告知两位，江青在历史上有“变节”行为。证人有二，第一个叫做刘晓。根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回忆，此人在“毛江联姻”前的组织调查时，就报告过江青的这段历史。但他的材料被当时主管情报和保卫的康生压了下来。直到临死，康生才交代了这条线索。那么，第二位证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为邓拓与白石老人之间的这桩买卖牵线搭桥的人——吴仲超。

可想而知，在1963年，只要康生对江青有那么一点暗示，江青就会足够激动的了……因此，他们明面上是要打邓——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背地里是要打吴。道理很简单，如果邓拓出了事，必然牵扯出吴仲超：谁要你把那幅如此贵重的画，弄到私人手里去了呢！

至于当时国家文物收购经费的不足，收藏条件的恶劣，研究力量的匮乏；在对外不开放的条件下，国家有“藏文物于民”的政策，连猴子都住着高级住宅的江青，是不可能知道的。而这一层，杨文也没有交代。

如果笔者的这层“推测”是站得住脚的话，我们可以认为，文革的所谓“路线斗争”、“派

系斗争”，有许多是与个人恩怨相关联，所谓“无产阶级的义愤”，掺杂着不少“挟私报复”的阴暗动机，是一目了然的。

2005年4月13日 于北京

□ 《动向》2005年5月号

~~~~~

【人物春秋】

王力沉浮录

• 霞 飞 •

在中国，有两个王力：一个是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原籍广西的王力，一个是曾在“文化大革命”前任中联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原籍江苏的王力。此文所说的王力，是指后一个王力。这个王力，曾经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红极一时的人物。

◇ 曾经是党内才俊，受到康生的提拔和推荐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先是在学校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六六八团做秘密工作。1940年，根据中央决定撤出东北军。不久，调往山东《大众日报》工作，由记者、编辑做到编辑部主任。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山东分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区党委委员。

在当时，王力可以说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中央下发的带有一定理论性的文件，他都能读懂，而且理解较快、较深，常常还能谈出自己的见解。在平时，他经常接受上级指派的任务，给一些基层干部谈一些理论问题。王力口才出众，常能深入浅出地剖析理论问题，分析当前形势，使听众很是信服。干部们有什么不懂的事情，也常去请教王力。

此外，王力还是个笔杆子。早在做党的地下工作时，他就能结合自己的工作写一些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报告，受到上级的好评。后来，王力在党的内部刊物上经常发表文章。这些文章，有材料、有观点，文笔也比较好，读后总能让人眼前一亮。王力到山东分局工作后，在任《大众日报》记者时，写文章更多了。他写的报道稿、评论稿，以及发表的一些带有理论性的文章，是这份报纸上的重头文章。王力的小说《晴天》发表后，在解放区流传很广。当时，在山东分局中工作的有点文化的干部，都把王力视为楷模。

青年时期的王力能在共产党内崭露头角，固然有他自己文化水平较高、文笔好、聪明能干、工作努力的因素，但还有一个外在因素，就是康生的大力提拔。

康生曾经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王力调到山东根据地工作后，正好在康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康生通过读报纸和在工作中接触，很快就发现了王力。

当时的康生，以理论家自居。在党内发表讲话时，也喜欢一套一套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摆出一副“党内理论家”的架势。康生也读过一些书，爱好舞文弄墨。这样，王力

与康生二人似乎有了某种共同点。两人的接触也就多了起来。王力经常是康生的座上客，康生闲下来也愿意到王力住的地方坐一坐。两个人谈诗论文，常常一谈就谈到深夜。这样，康生和王力虽然是上下级，但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康生在他的下属中，是比较垂青于王力的，经常安排王力做一些重要工作，让他执行一些重要任务。当时山东分局的一些重要文章，甚至给中央的报告，康生都安排王力执笔，或者参与起草。久而久之，王力就成了山东分局的“文胆”，成了山东分局离不开的人物。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解放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南方城市和广大地方，急需一批能力强、有培养前途的干部南下去建立政权。这时，康生想到了王力。他把王力列入了山东分局向中央推荐的几个干部名单中。中央同意了康生的意见。全国解放不久，中央将王力调往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

中共华东局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处处长，在当时已经是十分重要而且地位很高的职务了。那时，中央对华东局的工作十分重视，配备的干部也很精干。像王力这样资历的干部，能够担任这样的职务，已属凤毛麟角。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对华东各省市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对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解放日报》的社论，大多出自王力之手。

1953年，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越南。当时确定选择去越南的干部的标准：一是要政治上可靠，思想好；二是要有一定文化水平，工作能力强；三是要有国际主义献身的精神。同时，中央还有一个考虑，就是：选一些年纪轻、能力强的干部赴越南，一方面抗法援越，一方面接受锻炼和考验，以后回国后要重用这些干部。此时，康生又想到了王力。他亲自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名，建议派王力去越南。由于康生的举荐，王力被列为赴越工作人员之一。1953年底，王力即赴越南。当时，王力是以正司局级干部赴越南工作的，在赴越人员中，职务是比较高的。在越南，当然也受到重视。他一到越南，就担任了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组长，同时，还做组织和训练民兵的工作。

对王力的一生来说，这至关重要的两步，全赖康生的提拔和举荐，因此可以说，康生是王力的“恩师”。

◇ 一炮走红，进入中央文革小组

1955年10月，王力被调回国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又担任副总编辑。在红旗杂志社，王力写了不少国际评论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央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赏识。从1960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1964年起，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知道王力，王力也经常给中央写一些重要文稿。有些文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看到过，这就使王力在中央高层领导人心中挂上了号。50年代后期，中共中央有一个打算，就是要选一些年纪轻，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到中央担任部一级的领导职务，以后作为“苗子”来进一步培养，其中的优秀者，还可以再提拔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在考虑这类人选时，由于此前康生多次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面前替王力说好话，加上王力工作确有成绩，因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同意把王力选拔上来。

王力人生重要的一步，是担任中联部副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岗位。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

联络部，担负着了解世界政治动向，分析国际问题，帮助中共中央制定国际战略的任务。它实际上是既做重大的外交工作，又研究国际问题的部门。

王力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曾经10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中苏两党辩论时，我党发表的“十评”文章，王力曾参加起草。

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并且让康生当这篇文章的组织者和审稿人。康生在选执笔人时，选择了王力。王力深知写作此文的重要性和作者的分量，于是欣然受命。在康生的指导下，他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的大量历史文献，研读了一些毛泽东的有关重要著作，然后下笔写作。写作期间，王力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日冥思苦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草稿。康生看后，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王力按照康生的意见又修改了一遍，然后由康生转呈林彪。林彪看后，基本上认可。林彪还问康生起草人是谁，并让康生约王力到他住的地方来面谈一次。当王力如约来到林彪住的毛家湾一号时，身体不好、一般不见客的林彪亲自接见了，与他谈了很长时间。林彪问了王力的一些基本情况后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你要继续努力，好好工作。同时，林彪也对文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此次见面，王力给林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由于写作这篇文章，王力与林彪之间便有了一种亲近感。

1965年9月3日，署名“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这篇出自王力之手的文章，在介绍了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之后，着重强调该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断：毛泽东思想具有国际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对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新观点赞赏有加，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活泼，是一篇好文章。毛泽东赞赏这篇文章的话，很快就在中央高层中传开了，中央高级领导干部们更加赏识年轻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了。可以说，王力通过写这篇文章而“一炮走红”。

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并在党内公布了小组人员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王力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的排名是很靠前的，排在部队高级领导干部谢镗忠和著名历史学家尹达之后。另外，王力还担任着该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此后不久，谢、尹二人很快就被排除在中央文革小组之外，这样，王力就成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地位仅次于组长和副组长的“大员”了。王力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后，很快就与江青熟悉了。江青早就知道王力，欣赏王力头脑清楚，文笔好。不过，江青最欣赏王力的，是王力与她一样有极“左”的头脑。因此，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江青把王力当做第一号大员使用，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找王力商议，有什么重要文章，也让王力执笔。而此后不久，江青就成了中央文革的实际“当家人”。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1月8日，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宣传组，由江青提名，王力担任了组长。

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因为早已经是王力的恩师，对王力更是关爱有加。他经常把王力叫到自己的住处，向他面授机宜，有时还长谈至深夜。王力则进一步向自己的恩师靠拢，每有重大事情或者有自己考虑不透的事情，总要跑去请教康生。康生的话，他最信服，康生给他作出的指示，他不折不扣地照着去做。

进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只有江青、康生二人。

◇ 想在武汉“露一手”，结果捅了“大娄子”

1967年初上海发生一月夺权事件之后，全国的局势处在更加动荡之中。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为了落实毛泽东依靠人民解放军稳定局势的决定，1月25日，林彪、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等共同商议，拟出了七条规定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之后，十分重视。在对文字进行了修改之后，加上了一条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作为中央军委命令（简称“军委八条”）发出。“军委八条”发出后，军队立即行动，全国局势一度稳定了许多。

在“军委八条”发布后，武汉军区立即介入“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但没有得到军队支持的造反派组织不高兴了，他们和军队内部的一些造反派勾结起来，把矛头指向了武汉军区。2月初，这些造反派组织强占了红旗大楼，接管了长江日报社。3月，武汉造反派贴出了“打倒陈再道”、“枪毙钟汉华”的标语。武汉动荡的局势，使王力意识到“露一手”的机会来了。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到武汉去“一试身手”。

1967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了解情况。王力听说后，直接找到负责安排毛泽东行程的周恩来，要求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还说，江青已经同意了。周恩来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之前文到南方走了一趟，去向毛泽东汇报也好，就同意了。但周恩来同时向王力提出：到武汉后，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公开表态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王力答应了。

然而，7月14日，王力刚到武汉就违背了周恩来不准他公开露面的指示，上街去看大字报，并有意在湖北大学的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武汉的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称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亲人，欢迎他到武汉来解决问题。随后，王力便以中央“大员”的身份，陪谢富治同陈再道等人谈话，向陈再道和武汉军区其他领导人施压。7月17日，王力还跑到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左派”组织“百万雄师”的总部去，把“百万雄师”头头的名单弄到手，并公开指责“百万雄师”搞武斗，要求“百万雄师”管好自己的人，不要管别人。这一下，把“百万雄师”激怒了。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万余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大卡车和8辆消防车涌进武汉军区大院，高呼口号，并质问王力为什么说“百万雄师”不是革命组织，如不答复，明天全市罢工，“百万雄师”要在军区呆一个月。7月21日、22日、23日，又连续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群众在后几天还喊出了“毛主席受蒙蔽”、“打倒王力”、“江青靠边站”等口号，贴出了类似标语，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各地群众也举行示威游行，支持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件事，史称“七二〇”事件。这个事件，纯粹是王力捅的“大娄子”。

王力在武汉支持一派压一派，搅乱了毛泽东、周恩来要安定武汉大局的思想。而此时王力在哪里呢？原来，他被群众抓走之后不久，就被军队要了回来。后来，按周恩来的指示，他被武汉空军的刘丰保护起来，于7月22日派飞机送回北京。

王力回到北京时，江青等人为了表示对王力的支持，也为了树中央文革的威信，特意组织了许多人到机场迎接王力。此时的王力，腿上夸张地打着石膏和绷带。走下飞机时，在武汉被

吓得面如土色的王力，摆出了一副英雄的样子，向在机场欢迎他的人挥手致意。接着，王力以“凯旋者”的身份，乘车回到了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的地方。7月25日，在江青的安排下，北京搞了一个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集会，“热烈欢迎”王力等人从武汉“胜利地、光荣地回到北京”。

王力回北京后并没有安分。他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介绍“七二〇”事件，把责任都推到陈再道的身上，激起了不明真相的北京红卫兵和各地造反派组织对陈再道的义愤。他和关锋、戚本禹还一同去向江青汇报，要在北京找陈再道辩论。江青听后，马上去找周恩来，逼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与陈再道面对面辩论。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在7月26日召开了一个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请陈再道和钟汉华在会上谈一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没有让王、关、戚参加这次会议，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参加这次会议了。经过他们造谣、鼓动，北京的许多造反派组织和一些部队都认为陈再道要搞兵变，陈再道已是有口难辩，处于挨批的地位了。果然，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陈再道的质问集中在兵变问题上。有的军队高级领导人还把陈再道指责为钻进革命队伍中的蒋介石，说武汉军区是汉奸窝，“七二〇”事件是反革命叛乱。当陈再道进行辩解时，他的领章、帽徽被撕掉，讨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第二天，陈再道、钟汉华被撤销军区司令员和军区政委职务。

王力并不只是搞乱军队就罢手。8月上旬，王力按照江青、康生的旨意，把制造动乱的手伸向了外交部。他们觉得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那时，外交部的造反派在王、关、戚的策划下，组成了千人的“揪陈大军”，要揪斗陈毅，并且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8月7日，王力约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人，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权。王力在谈话中说，要打倒陈毅，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他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冲击并砸了外交部，宣布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造成极坏的国际影响。

◇ 毛泽东亲自下令将王力“抓起来”

“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对王力并无恶感。毛泽东赏识王力，江青、康生也在周恩来面前说王力的好话。在他们的推荐下，周恩来也认为王力年轻，头脑灵活，有能力，能写。因此，当时周恩来对王力也曾经抱有很大期望。“七二〇”事件中王力被群众抓住扣押时，周恩来对王力的处境很关心，想方设法打听到了王力的下落，让武汉空军设法保护王力，并派飞机把王力送回了北京。北京举行的欢迎王力的“百万军民集会”，周恩来也参加了。但此时周恩来对王力的行为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在会上没有讲话。

王力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使周恩来看透了王力，认定王力居心不良。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恩来还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

本来，在康生、江青的一再推荐下，毛泽东对王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现也是很有

好感的。“七二〇”事件之前，毛泽东也没有看透王力，他当时只是认为王力过左，对群众的态度很凶，不听他的话。当时，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王力，但也没有认为他是坏人。后来他说过，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毛泽东那时只是认为王力同他不一致，王力的方法不对，并没有认识到王力是坏人。

“七二〇”事件后，王力等人向毛泽东、党中央汇报时，都说陈再道要搞兵变，要发动反革命暴乱。他们向林彪写了一个材料，说武汉有发生兵变的危险。林彪听后也相信这种说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邱会作飞往武汉，让毛泽东迅速离开武汉。

毛泽东到达上海后，越想越不对头。他经过两天的独立思考，认定陈再道不是搞兵变。7月24日，毛泽东在同杨成武谈话时问：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杨成武回答说：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毛泽东又问：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回答：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毛泽东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再道、钟汉华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泽东也知道了。此时，毛泽东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8月25日，周恩来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他。8月26日上午，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 被关押之后的王力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可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他当时的考虑是：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同时，王、关、戚深受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任，他们会保护王、关、戚的，如果只由自己单独行动抓王、关、戚，江青、康生、陈伯达会闹事。只有通过开会的办法；在会上把毛泽东的指示说清楚，才能动手抓王、关二人，并让戚停职检查。周恩来预先在钓鱼台单独和陈伯达谈了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表示拥护毛主席的决策。这样，就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做好这些事情后，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参加。然后，周恩来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决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

准备停当后，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王力他们走进会场时，仍然是往常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会议开始后，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恩来一板一眼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恩来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恩来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恩来的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恩来宣布的是毛泽东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此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请假检讨”后的王力与关锋，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不同的楼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间不能见面。因此，王力和关锋实际上是被限制行动的。

王力被软禁在钓鱼台2号楼后，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每天的伙食标准还和他在台上一样，每天都能看到最新的报纸，还允许听收音机，在规定的范围内还可以自由活动。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因此，他在2号楼过了一段清闲的日子。使他难受的是，他不能打电话或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10月16日，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仍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这座别墅的四周环境很好。王力在那里，每日的活动也很有规律。他每天起床洗漱后，就在规定的地方锻炼身体。活动一会儿后，去吃早饭，然后是看书、看报、听广播。午饭后再小睡一会儿，下午继续看书、看报、写检讨。晚饭后还可以活动一会儿，散散步，然后就早早睡下了。由于条件好，加上生活有规律，王力的身体反而比被软禁前强健了许多。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住得不好，吃得也很差。但与众不同的是，毛泽东曾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放了出来。刚出来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住了一段时间后，他感到不满意，说是门口有人站岗，提出要迁居。1984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里，供给他两套房子，很宽敞。他和老伴，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他喜欢读书，还不时写点儿小文章。1982年4月《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他关于纠正引用古文时误用两字的信，还对他的信加了编者按，编者按中称王力为同志。但是，那时乃至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此王力是彼语言学家王力，没有太注意此事。

自1982年1月以后，王力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虽然有保姆照顾，但他还是愿意和老伴一起上街买东西，一起打理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后虽经医生多方治疗，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终年75岁。

□ 《党史博览》2005. 4

~~~~~

## 【往事回首】

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

• 李达南 •

◇ “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艺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序幕。11月30日《人民日报》奉命转载，周恩来虽在他修改审定的“编者按”中设法把问题放在学术讨论范围内，但也无济于事。1966年1月，林彪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解放军报》连续发表突出政治的七篇社论，同根据周恩来意见撰写的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条密切结合的三篇《人民日报》社论唱对台戏。2月8日，外交部召开第四次驻外使节会议，周恩来作报告，讲了形势，国际反美统一战线，越南战争，外事工作，学习毛主席著作等五个问题。在最后一部分，他对当时的一些提法显然是保留的，内心比较矛盾，讲得有些乱。事后，他指示外交部把这一讲话记录全部收回销毁，一份不留。副外长姬鹏飞为了存档，还是让外交部保留了一份。

1967年1月初，“文革”已进行了半年多，我国驻印度使馆和缅甸使馆部分人员奉命回国参加“文革”学习班。那时正逢上海一月夺权和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被陈伯达威逼自杀。飞机在昆明停留时，因当时两派红卫兵抢飞机上北京而使飞行受阻。我们在候机室冻了一夜，耿飚大使直接同北京联系。周恩来打电话批评红卫兵，指出这是国际航班，不能抢用。驻外使馆人员在京到刘后，周恩来在政协礼堂向大家讲话，希望大家好好学习，三个月后再回使馆继续工作。当时即有个别造反派递条子，打断周恩来讲，表示运动不结束不回馆。周恩来生气地说，今天你们来听我讲话的，让不让我说下去？大家对个别造反派的无理行为十分气愤，热烈鼓掌表示拥护和支持周恩来的讲话。2月2日，周恩来因长期劳累感到异常不适，经会诊发现有心脏病，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的健康担忧，于次日贴出大字报，要求他改变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周恩来虽在大字报上写了“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仍坚持工作。2月7日，周恩来在修改驻外使馆开展“文革”运动的指示稿中，规定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五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扫，大辩论，大串连），使馆内不建立战斗组织，不能进行夺权。强调已建立战斗组织的“应在使馆党委领导下转为文革学习小组，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无监督权”，“不容直接干涉使馆党委行使职权”。当时周恩来必须要与“文革小组”周旋，请陈伯达、江青（中央文革小组正副组长）到外交部礼堂同驻外使馆回国参加学习班的同志见面。另一方面，周总理又要应付造反派，5月10日晚劝说外事口造反派不要开大会揪斗陈毅。周恩来说，我要抗议，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现在还有几个副总理，我要一个一个地保，我们还要做工作。我的身体，一年就成了这样，你们总要让我们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6月间，康生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说：“最近我看了一些文件，发现不是三和一少问题，是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周恩来当面质问康生：外交部总的政策不论是我兼外交部长的时候，还是陈毅当外交部长的时候，都经过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对外政策基本上主席讲的，我们办具体事。康生推说这是指中联部的王稼祥。8月7日，我在楼上看到

周恩来站在正义路外交部院内进口处，在烈日下不进入，坚持要造反派把会场内“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取下。8月27日，外事口造反派在批判陈毅问题上无理纠缠，周恩来怒斥说：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造反派置之不理，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发作，在场的保健医生扶他离开会场。造反派仍不甘休，在后面喊：“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还要再冲会场”。走到门口的周恩来转身怒斥：“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在保卫外交大权上，周恩来十分坚决。他声明：“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强调陈毅是外长，代表国家，是国际影响问题，对他的批判只能在外交部内，不能在部外搞，不能上街游行，大字报不能上街。1967年5月15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时批评他们为揪陈毅而冲入外交部，说：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我把政策交代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没这么简单。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以后谁也不许去冲，谁去扣留谁。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5月18日，北京开群众大会，谴责港英当局对香港罢工游行工人进行镇压。外交部有关领导未建议陈毅出席。周恩来知道后提出批评：“群众大会不要陈毅同志出席，这不行，现在还没有免他的职，批判是内部的，这不叫和稀泥。不要陈毅同志出席是错误的，没有照顾大局。我不怕骂，我知道主席的方针才这样做。如果陈毅同志不出席，敌人就知道我内部有矛盾，就会更凶。外交部方案中没有提，你们软弱，怕丢饭碗。”

1967年8月7日，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煽动夺外交部大权，次日，王力向江青、陈伯达汇报，江青、陈伯达均表示支持。8日，周恩来看到此讲话的传单后，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一谈，但康、王均未到场。8月中旬，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并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外交大权旁落了许多天。周恩来为此十分焦急，8月25日凌晨一时，他找由上海回京的杨成武同志谈话，讲王力煽动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权，以及8月22日火烧英代办处等情况，并把王力“八·七讲话”交杨成武转送毛泽东。当日杨飞上海见毛泽东，毛泽东在26日听取杨的汇报后说：王、关、戚（指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并在王力8月7日讲话上批语：“大、大、大毒草”。当日周恩来根据杨的报告，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先后隔离、审查了王、关、戚，从而第一次挫败了江青集团的阴谋。

◇ “大使馆本身都不能存在下去，还能作什么宣传？”

“文革”初期，康生煽动群众，说什么“必须把反对国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世界上反对一小撮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结合起来”，打着支持世界革命的旗帜，对外交事件无限上纲，并动辄搞抗议游行，与各国关系搞得异常紧张，发生了“三砸一烧”（砸缅甸、印度、印尼使馆，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使我国的国际声誉受到严重影响。周恩来对此坚决反对，多次明确表示：“不能每个外交活动都无限上纲，如无限上纲，把所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都说成是敌人，这完全不符合毛主席关于团结多数，打击主要敌人，各个击破的思想”，“反对帝、修、反，也要有主次之分”。他斥责说：“就是那些人在后面搞名堂，幸灾乐祸”，“大使馆本身都不能存在下来，还能作什么宣传？”

1967年港英当局镇压工人罢工，周恩来一方面主张坚决斗争，另一方面又非常注意斗争策略。指出斗争要立足于本地，要以政治斗争为主，主要靠当地人民，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文斗英方无法阻止，武斗英方会镇压，而且容易被美国利用。他并指出，60年代在香港投资



的主要是华商，香港70%的日用品，90%的副食品都是我内地供应的，如果搞同盟总罢工，我们上述商品进不了香港，日本商人就会去占领市场，台湾人也会进去代替罢工工人；而且长期罢工，工人无工资收入，生活要靠国家救济，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对我更加不利。当时有关外事部门人员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方针政策，搞了一系列极“左”行动。周恩来批评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对英斗争还是不要主动出击，我们虽不承认香港是国外，但它还是处在英国统治下，我们既不收回，又不同英国打仗，他们法律完全不遵守不行，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他先后批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港英警察打死打伤游行工人的数字上作夸大报导。新华社说当时打死打伤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报》又据新华社消息，在第八版刊登并加上了“血腥大屠杀”的标题。周恩来指示新华社进行核实，结果发现实际上只死一人，伤数人。周恩来批评说：“这是严重的失实，更加激起人民的义愤，使我国在政治上被动”，“发这样重大的消息，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你们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么？”他批评外交部在6月6日照会中提到“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在中国大门口的挑衅军事演习，否则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说：“我们采取必要的措施是什么？你们跟总参商量的没有，你们外交不和国防联系，照会写上就是放空炮，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现在斗争逐步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很被动。”8月22日，在坏人煽动下，发生了烧砸英国代办处事件，周恩来在紧急情况下，指派解放军劝说群众撤出，保护被揪斗的英代办处人员，事先设法拉江青、康生、陈伯达，由他带头，四人共同签名广播，劝群众不要冲入英国代办处，要尽快撤出，极力防止事态扩大。事后他对自己在极度繁忙和疲劳的情况下批发了限英方在48小时内启封香港三家小报事多次作自我批评，同时批评外交部提限48小时是不考虑后果，明知英方不会接受还这样提。

1967年9月，中国驻柬人员受极“左”思潮影响干涉柬内政，西哈努克宣布解散柬中友协。周恩来对中国驻柬人员提出批评。13日，西哈努克宣布撤回驻华使馆人员，但不断交。周恩来于14日接见柬驻华大使张岗，对此表示遗憾，同时进行劝说和挽留。18日西哈努克宣布撤消其撤回使馆人员的决定。

1967年，由于在仰光的华侨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后又牵涉到中国驻缅甸使馆。6月26日，一暴徒进入中国驻缅甸使馆杀害我一名专家。王力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治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断交。中国驻缅甸使馆也有人提出对缅甸斗争“要不怕断交，不惜断交”。甚至要“逼它狗急跳墙，逼它断交”。周恩来知道后批评道：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提逼它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这是不对的。后来中缅关系得到改善，1971年8月，缅甸总理奈温来华访问，对1967年6月26日的事件表示“深切的遗憾”，并感谢周恩来给他机会来解释两国间可能存在的误会。周恩来说：“1967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当时使馆发给你们外交部的有些照会未经过我国外交部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到现在也还没有搞清楚到底有几个照会是未经外交部批准就送到你们外交部的，可能从你们的档案中可以找到。”

1967年6月，印度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等两名外交官闯入北京西郊偷掘军事设施，被发现后，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印方作为报复，宣布我国一等秘书等两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纵容暴徒闯入中国使馆院内，捣毁办公楼和毒打我外交官和工作人员8人。驻印度使馆曾来电认为我们应作为对等，再驱逐印度驻华使馆一名一秘。周恩来在电报上批示：此议不妥，不能这样做，如一再升级，有可能导致两国中止外交关系。由于我国保持克制态度，北京群众未进入印度使馆，事态得到控制。

1967年，印尼群众冲入中国使馆，使我一工作人员受伤，印尼副外长来馆慰问，被使馆人员轰出去。接着发生北京群众砸印尼驻华使馆事件。同年10月，中国不得不宣布从印尼撤回使馆。周恩来亲自把对外声明中“断绝外交关系”改为“中断外交关系”，从而留有余地，

为今后两国复交创造了条件。

1969年3月，发生苏边防军武装入侵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事件。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周恩来多次指示中国边防部队要严格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行事。他修改的《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衅，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群众队伍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要划一道线。3月6日，周恩来将宣传部门送审的原稿中“苏修边防军”、“苏修武装部队”中的“苏修”一律改为“苏联”。同年9月11日，周恩来在首都机场会见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来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向苏方提出：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中苏边界问题可以通过谈判最终解决，在此之前两方应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从此中苏决定开始边界谈判并互派大使，使和缓两国关系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0月，周恩来在外交部有关谈判的文件上批示：“在双方会晤中，如苏方态度好，我方应相应对待，不要每次见面，都要挑起争端，更不要在争吵后，必喊打倒苏修，打倒社会帝国主义。谈判总要做得认真严肃，以理服人，而不是每谈必吵，每吵必骂，才算是针锋相对。”

“文革”初期，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的一位二等秘书，去港口看望船员，途中因车祸而死亡。使馆武断地认为是德方故意挑衅谋害，当民主德国派副外长来中国使馆吊唁时，竟把他轰出去。中国外交部派出调查组去现场调查，认为德方介绍有道理，是车祸，而且车祸主要责任在我方，不是谋害。当时还有人不服，周恩来以40年代在重庆时工作人员李少石外出因车祸而死的例子，说明要实事求是，不能这样看。

◇ 对外宣传要见缝插针。铁板一块就插不进去，一插就插断了。

1967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学生时说：毛主席语录不要乱用，不然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那天我到钓鱼台（国宾馆）陪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坐下，服务员就读“一切魔鬼统统都要被消灭”那条语录，你这样做就等于骂他。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样做不对，牛头不对马嘴。吃饭时也读语录不恰当。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对外宣传要见缝插针，见缝插针也得有缝。铁板一块就插不进去，一插就插断了。见缝插针插得进去，见缝插棍子就不行。不能倾盆大雨。

1967年后中国驻外大使职位除埃及外全部空缺，为尽快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到1969年7月下旬止，周恩来先后指示和安排14名驻外大使回任或到任。1969年6月4日，周恩来接见即将赴任的大使时指出：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要注意总结经验，落实政策。针对“文革”以来对外滥送毛主席像章和语录等情况，他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要慎之又慎。他对国内滥用毛主席语录也同样提出意见。1970年9月2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等单位的领导成员说：《参考资料》（新华社出的一种内部刊物）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经过研究，并请示了毛主席，从9月5日起，不要登语录了，《共运资料》上也不登了。9月8日，他告知交通部，邮票上不许再印毛主席像、语录、指示和诗词。12月23日，他在同外交部负责人谈话时批评外事工作中存在的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的错误倾向，指出：不调查研究，不请教人家，主观主义，骄傲自满，背包袱，好像只有我们是革命的，人家都是不革命的，其思想根源是大国沙文主义。

在“文革”初期外交工作受到冲击，但周恩来还是积极主张外交部和驻外使馆要注意开展对外活动和搞调研工作。1968年8月20日，周恩来对阿尔巴尼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说：现在埋在国内各省的文件里了，所以国际活动就更少了。我很坦率地说，现在比解放战争时忙得多，真正打仗也不这样忙。每天都遇到问题，时间总是不够用。人手不是多，而是少了。1

1969年6月，周恩来安排陈毅等四位老帅成立“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先后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等方面的调研报告。同年11月29日，周恩来在外交部编印的一份情况反映材料上批示：“我方外交人员和译员，也要主动向对我友好的国家外交使节进行活动，这是重大的外交任务。不要‘闭门家中坐，担心鬼叫门’”。1970年9月24日，周恩来同外交部负责人谈话时说，有些人就喜欢人家说好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我们的事就报喜不报忧，对人家的就报忧不报喜。这些都是主观主义。我们应当学习人家的长处，不要只注意人家的短处。同年11月18日，周恩来约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开会，指出：现在各部门见了外国朋友不敢讲话，彼此苦恼。要作为一个问题研究一下，要客观地解决这些问题。搞外交不是坐“冷板凳”，而是“热板凳”，要积极、主动地与外界接触，到处找工作做，要自己给自己创造条件。关起门来，等人家来创造条件，等人家送上门来是不行的。

#### ◇ 《新情况》引起的风波

1973年7月，外交部新闻司出版的《新情况》第153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作者是欧美司美大组的张再同志。文章谈到美苏矛盾，同时根据当时情况，强调了双方勾结妥协的一面，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7月3日，周恩来从外交部部长助理章文晋处得知毛泽东对这期《新情况》的批评意见后，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事实上，这一期《新情况》，事先由章文晋审定，部领导姬鹏飞、韩念龙等都曾圈阅，周恩来阅后认为文章还有些新意。由于他敏锐地感到这次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他的，他就主动承担了主要责任，以保护外交部的同志，同时也为了在调研工作中保护讨论和钻研问题时提出不同意见的积极性不受到打击。

7月4日，毛泽东约见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新情况》中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了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7月5日，周恩来将3日写给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的信和4日外交部核心小组就该期《新情况》问题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一并送毛泽东阅，并附信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毛泽东在周恩来3日写给外交部的信上批示：“此种顽症，各种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12日，周恩来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起草批评并纠正该期《新情况》观点的文章。之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此事。14日，周恩来审阅、修改由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在该文分析美苏两霸既争夺又勾结处增写：“（美苏）争夺是长期目的，是实质，勾结是表面现象，互相利用为自己利益服务，而且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同时，也会从反面教育出更多的人民觉悟起来，反对两霸。”15日，将此文送毛泽东审定，并传部分政治局成员核阅，同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内“严厉”二字删去，并批示：“检讨不要写了。”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批告外交部：将《〈新情况〉153号错误何在？》一文及《新情况》153号除发原单位外，加发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此外，外交部作为善后，把张再同志调出外交部，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章文晋也于同年9月外放到加拿大任大使。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同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来访，周恩来和叶剑英同他举行多次会谈。当时外报载有记者维克多透露苏联准备对我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

术加以摧毁的企图，后来证明此消息并非空穴来风。基辛格试探问：如果苏联采取此行动，中国方面希望美国做些什么？周恩来在请示毛泽东后答：此事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基辛格在离京前清晨要求再见周恩来一面。周打电话请示毛泽东，对方说毛已睡了。周以往有谈话口径，不见面不好而见了基辛格。基辛格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周回答说：此事需要考虑，等以后再说。这实际上仍是按原口径的一种婉拒。但王海容、唐闻生（译员）认为周恩来右了，是说错了话，直接向毛泽东汇报。11月17日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18日，周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根据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吸收外交部更多人参加。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四老”，“四小”。“四老”即姬鹏飞、黄镇、乔冠华和仲曦东；“四小”是：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和齐宗华。会议从11月21日起到12月初，共开了10多天，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12月9日，毛泽东向王海容和唐闻生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又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同日，毛泽东把这个看法也分别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讲了。至此，批斗周恩来的会议才告一段落。

□ 《百年潮》 2003. 1

~~~~~

【历史一页】

陆定一谈文革经历

• 纪希晨 •

我翻阅历史资料，发现陆定一同志在1990年11月30日，同我谈他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番话。

现把记录原文照抄如下，供读者参阅。

1990年11月30日下午，我到北京医院看望原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他这年85岁了，但头脑清晰，记忆力很好，仍然十分健谈。

谈起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陆定一同志说：

1967年10月9日这天，我被捕了。连续三天，有九个人审讯我。动了刑，没有结果。就给我上手铐，刺进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

他们根本不问我，也不问彭、罗、陆、杨的关系，硬给我加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

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们要的“招供”！

从此，我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假话，他们都爱听。他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假话。不说怎么办？死不了，就得说假话。党内有些人就爱听假话。

口子一开，堵不住了。我就按他们要的，写了假口供。

接着，他们就把我送进监狱。

我的编号是68164号，即1968年1号要犯，64号。

从1968年到1978年，我住了11年监狱。还关了两年的看守所，共13年。

1978年12月2日，才放我出来。

在监狱，受虐待，我生了气。想不通，生闷气，肚子里生起硬块，眼底开始出血。

把我送到同仁医院，用镜子一检查，医生说，你这病，要靠你自己治。你要自己消气，把硬块消化吸收。你不要生气，你要学会笑，大声地笑。

从医院回到秦城监狱，我就学笑。不笑也要笑，哈哈大笑，像演戏的大花脸那样，哈哈大笑。

监狱里，有一块门板，上下两部分。哨兵上上下下望，干涉我，要我不要笑，禁止我笑。我说，我有笑的本事。

不让笑，怎么办？我就唱，大声地唱。又笑又唱，又唱又笑，经过半年多，用笑用唱的方法，果然治好了肚子里的硬块。

狱方天天要我写。这个人你认得吗？我说，不认得，不认得！不行！于是，只好写认得。写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认识的，认识后干了些什么。其实，这个人，我根本不认得。

在监狱期间，只过节日时才给我放放风。

关于二月提纲（1966年），毛主席最早要我当文革组长。我不干，就叫彭真当文革组长。主席在武汉，康生、彭真约我一块去，我们汇报了。

康生鬼得很。他说，他不知道二月提纲，是背着他干的，是彭真一个人的意见，就把彭真打倒。其实，讨论“提纲”，他完全同意，他没说一句不同意的话。

谈到文革发生的原因，陆定一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党不成熟。对革命战争，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有一套经验，但对搞社会主义建设，却没有经验，很不成熟。明知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

毛主席95岁诞辰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党经过早年时期，经过反对陈独秀、反对王明的斗争。反王明路线是最困难的，一反反了十年，这是因为王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直到1942年整风，才把王明路线反掉。

毛泽东主张调查研究，懂得国情，懂得实际。搞革命，一要马列知识，二要实际经验。

王明、博古都是极端的教条主义者。博古也是两个凡是，一是凡是马列主义书本的话都执行，二是凡是共产国际的话都执行。

毛泽东晚年骄傲了，听不进别人的话。

他同群众关系也变了，不是从实际出发，不为群众服务。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 《炎黄春秋》2005. 7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丁凯文（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